



中山大學 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 工作簡報

第四十七期

二零二零年七月編印

# 目 录

## 中心动态

- 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召开 .....1
- 《实践哲学评论》第四辑出版 .....1
- 徐长福在 *Studies in Marxism* 发表英文文章 .....1
- 徐长福英文著作 *Marxis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书评一则 .....2
- 王兴赛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 .....2
- 徐长福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发表文章 .....3
- 郝亿春在《哲学动态》发表文章 .....3
- 林进平在《世界哲学》发表文章 .....3
- 徐长福参加“法律与实践：2019 学人论坛” .....3
- 徐长福参加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年国际会议 .....4
- 郝亿春、江璐参加“古典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审思”研讨会 .....4
- 王兴赛参加第二届德国观念论论坛 .....4
- 施娜参加“新中国 70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党的建设”研讨会 4
- 刘畅参加 2019 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论坛 .....5
- 刘畅参加第十届“哲学之道”学术论坛 .....5
- 徐长福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优秀 .....5
- 马天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结项 .....5
- 凌菲霞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7 批面上资助 .....5
- 徐长福文章被评为 2019 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宗教类最受欢迎

文章.....6

●侯小丰访问学者计划圆满完成 .....6

## 学术活动

●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综述 .....7

●实践哲学讲坛第20期综述 .....18

●实践哲学讲坛第21期综述 .....19

●实践哲学讲坛第22期综述 .....21

●实践哲学讲坛第23期综述 .....25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23期综述 .....27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24期综述 .....29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10期综述 .....30

●郑劲超岭南青年哲学沙龙报告综述.....32

## 成果摘要

●《实践哲学评论》第四辑“编者的话”节选.....36

●Xu Changfu: “Should the People’s Consent Be the Basis for Serving the People?” .....39

●王兴赛：《从黑格尔的“Handlung”到马克思的“Praxis”》.....39

●徐长福：《“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的辩证法》.....39

●郝亿春：《“意志”缺席？“谁”来负责？》.....40

●林进平：《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何以是“马克思主义的”》.....40

●梅谦立：《康熙年间两广总督石琳与法国船“安菲特利特号”的广州之行》.....41

●林进平：《析“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伍德式阐释及其缺陷》	…41
●林育川：《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系》	……41
●胡志刚：《康德主谓关系思想的批判性分析》	……42
●胡志刚：《黑格尔主谓关系思想的批判性分析》	……42
●张守奎：《马克思对道德虚无主义的超越》	……43
●王兴赛：《青年黑格尔与启蒙》	……43
●肖恩·塞耶斯：《恩格斯与唯物主义》（覃万历译）	……44
●周宏胤：《句形树白描——符号指谓的句法结构图解》	……44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

邮编 510275

责任编辑：刘畅

校对：凌菲霞、王兴赛

## ◆中心动态◆

### 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召开

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简称“马哲所”）和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联名举办的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于2019年11月23-2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园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和台湾辅仁大学等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求是学刊》、《天津社会科学》、《江海学刊》、《学术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学术媒体的9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 《实践哲学评论》第四辑出版

由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主编、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类刊物《实践哲学评论》第四辑于2019年11月正式出版。本辑执行编辑为中心成员王兴赛副研究员。本辑共设“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名家专论”、“经典译译”、“旧作新读”、“异质性哲学园地”、“哲人心路”和“批评和对话”7个板块，共收录20篇文章。本辑的部分成果为徐长福教授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批准号：13AZX00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理想”（批准号：16JJD710015）的阶段成果。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为本辑出版提供了主要的财政支持。

### 徐长福在 *Studies in Marxism* 发表英文文章

2020年2月，徐长福教授英文文章“Should the People’s Consent Be the Basis for Serving the People—Rethinking the Debate between Lenin and Kautsky o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发表于 *Studies in Marxism* (Volume 15)，该文中文版曾发表于《实践哲学评论》（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3-27页）。*Studies in Marxism* 是一本同行评议的不定期出版刊物，收录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讨论，以及关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政治事件的讨论，其选文的唯一标准是文章的学术水准。*Studies in Marxism (Volume 15)*共收录四篇主要文章，并设立了书评栏目。

## 徐长福英文著作 *Marxis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书评一则

2020年2月出版的 *Studies in Marxism* (Volume 15) 收录了主编兼英国提兹塞德大学犯罪学准教授 (Reader) 马克·考林 (Mark Cowling) 对徐长福教授 *Marxis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vised edition) 的书评。考林在开篇中写道：“这是一本有趣且有胆识的论文集……该论文集的一个显著主题是，注入西方自由主义将会使当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获益。作者萦绕于心的主要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一种极为有活力和能动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政治方面：思想、出版和表达自由。”考林对论文集的每一篇文章进行了评论。最后，考林指出：“总之，这是一本真正有趣的论文集。它既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发展了一些有趣的理论，又为中国社会的运转提供了一种洞见。我希望它能得到广泛阅读。”关于该英文著作，英国肯特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肖恩·塞耶斯 (Sean Sayers)、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系主任德米特里·尼库林教授 (Dmitri Nikulin) 和著名哲学家汤姆·洛克莫尔 (Tom Rockmore) 都曾分别撰写过书评。

## 王兴赛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

王兴赛副研究员在《哲学研究》2020年第2期发表文章《从黑格尔的“Handlung”到马克思的“Praxis”——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的两个主题词及其演替》。该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理想” (编号: 16JJD71001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编号: 2018M633263)、中山大学2017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编号: 17wkpy49) 的阶段性成果。

## 徐长福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发表文章

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发表文章《“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的辩证法——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发生学考察》。该文系徐长福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理想”（编号：16JJD710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郝亿春在《哲学动态》发表文章

中心成员郝亿春教授在《哲学动态》2020年第2期发表文章《“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批评》。该文最初是受聂敏里教授之约，对其在“《哲学研究》2018年度学术论坛”中的主题论文《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进行的评论。

## 林进平在《世界哲学》发表文章

中心成员林进平教授在《世界哲学》2020年第3期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何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对英美学者建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批判性省思》。该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18VSI03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研究”（16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 徐长福参加“法律与实践：2019学人论坛”

2019年11月15日，徐长福教授应邀参加由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治理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法律与实践：2019学人论坛”，并在“法律与实践：其他学科视角”与“实践哲学研究的新动向”两个单元分别作了专题报告。报告题为“实践哲学在当今时代的学科定位”。在报告上，徐长福教授严谨地对“实践哲学”这一术语进行了考察，并在随后介绍了实践哲学的传统学科定位及其演化。此外，徐长福教授还分享了他对实践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以及有关实践哲学的学理界定的思考。

## 徐长福参加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年国际会议

徐长福教授获邀参加德国伍珀塔尔大学（Bergische Universität Wuppertal）在 2020 年 2 月 19-21 日举办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历史人物的合时性（Friedrich Engels: Die Aktualität eines Klassikers – The Timeliness of a Historic Figure）”国际会议。因疫情原因徐长福教授无法亲自前往，由中心成员凌菲霞博士代为朗读其英文文章“On Engels’ Thought of the End of Philosophy”，并录制该朗读视频发给会议方在大会上播放，作为徐长福参加该会议的特殊形式。会后该文章被收录进大会的会议论文集。

## 郝亿春、江璐参加“古典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审思”研讨会

2020 年 1 月 4-5 日，中心成员郝亿春教授、江璐副教授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聂敏里教授发起的“古典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审思”学术会议。本次会议是聂敏里教授拟定的“德性与自由”系列论坛的第一届会议。郝亿春教授、江璐副教授作了报告，郝亿春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在“实然”本性与“应然”本性之间——略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一种张力》，江璐副教授报告的题目为《道德责任和选择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和奥卡姆》。

## 王兴赛参加第二届德国观念论论坛

2019 年 11 月 8-10 日，中心成员王兴赛副研究员参加了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德国哲学学会、中国康德学会、《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德国观念论论坛。王兴赛提交了论文并作了报告，报告题目是《黑格尔的 Handlung 概念与马克思的 Praxis 概念比较》。

## 施娜参加“新中国 70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党的建设”研讨会

2019 年 11 月 2 日，中心成员施娜博士生受邀参加在西北大学举办的“新中国 70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党的建设”学术研讨会，并以《从日语文献着手考证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及形成过程》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 刘畅参加 2019 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论坛

2019 年 12 月 13-14 日，中心成员刘畅博士生受邀参加在武汉大学举办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论坛，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失语及发声》为题作了发言，并获“优秀报告奖”。

## 刘畅参加第十届“哲学之道”学术论坛

2020 年 6 月 13-14 日，刘畅博士生受邀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举办的线上“哲学之道”博士生学术论坛，并以《从〈反杜林论〉看科学社会主义的元伦理学性质——兼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三层分层》为题作了报告，获论文三等奖。

## 徐长福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优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平台 2020 年 6 月 2 日发布的《2020 年 5 月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结项情况》，徐长福教授的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结项通过，结项成果《马克思的句法革命与宪法革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获评“优秀”。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共验收 452 个项目结项申请，经同行专家鉴定，363 个项目予以结项，13 个项目被评为“优秀”。

## 马天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结项

2020 年 5 月 16 日，中心成员马天俊教授的项目“《资本论》哲学前提的修辞学研究”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鉴定，准予结项。该项目类别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地名称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 凌菲霞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7 批面上资助

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2020 年 7 月 7 日发布的消息，中心成员凌菲霞博士获得第 67 批面上资助。本批次共资助 3703 人。获资助项目名称为“马克思传

记史研究”，该项目将从时间、国别、传记方法等维度研究 1885 年至今的 82 种马克思传，梳理马克思传记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 徐长福文章被评为 2019 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宗教类最受欢迎文章

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官方微信平台 2020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2019 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宗教学类最受欢迎文章集萃》中，徐长福教授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重区分》名列首位。该文章首发于《哲学研究》杂志 2019 年第 7 期，转载于《哲学原理》2019 年第 11 期。

另据该微信平台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9 年版）》，徐长福教授也入选为哲学重要作者（共 77 位）。

## 侯小丰访问学者计划圆满完成

2020 年 7 月，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资深编辑侯小丰研究员圆满完成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计划。侯小丰研究员自 2018 年 9 月起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合作导师为徐长福教授。在两年的访学期间，侯小丰研究员主要做她本人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自由思想研究”，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侯小丰研究员积极参与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相关学术活动。2019 年 1 月 10 日，侯小丰研究员在“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52 期做了专题讲座，题目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理论主旨比较》。2019 年 11 月 23-25 日，侯小丰研究员参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作了专题报告并主持会议。另外，侯小丰研究员有丰富的期刊编辑经验，几年前就曾应邀到中山大学给哲学系研究生讲授哲学论文写作课，在访学期间，侯小丰研究员积极参与实践哲学方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论文写作的指导工作，为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提供了很多切实的帮助。总之，侯小丰研究员在访学期间让徐长福教授团队成员都受益匪浅。

## ◆学术活动◆

### 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综述

2019年11月23日上午9点，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正式开幕。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和中山大学马哲所所长李萍教授致辞。张伟主任指出，实践哲学中文论坛是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用汉语切磋实践哲学研究所搭建的交流平台，这种学术语言的自觉所体现的是对中华文明的担当意识。李萍所长指出，这届论坛是中文学界以实践哲学为专题的一次盛会，不仅参会人数多，而且学者来自多个学科，议题论域广，论文水平高，符合本论坛品质第一的宗旨。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实践哲学的学科定位”，研讨实践哲学在哲学学科和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包括其历史情况和国别差异。本届论坛沿用前两届论坛的做法，通过双向匿名评审来遴选发言论文。本届论坛共收到应征论文100多篇，选出了71篇，设大会发言与分会研讨（包括三个分会场，分会场中每篇报告均设评论人）。本届论坛的口号是：求必要之同，存充分之异。

11月23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以“实践哲学的主旨”为议题，分为两组，分别由《哲学研究》黄慧珍编审与辅仁大学尤煌杰教授主持。



第一组发言的有 5 位教授：南开大学王南湜、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黑龙江大学丁立群、辅仁大学潘小慧和中山大学李萍。王南湜从人类的三重旨趣（我们可以期望什么、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着眼讨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中与之相应的三种辩证法：作为价值理想建构的历史辩证法、作为科学理论建构方式的历史化的先验逻辑或知性辩证法、作为形成实际行动方案的实践智慧或实践辩证法。杨国荣指出，相对于以“物”观之、以“心”观之和以“言”观之，以“事”观之是基于人的现实活动及其结果来理解世界和变革世界；“事”与“道”“德”“天”“性”“实践”和“行”等范畴既有相关性，又有所不同；作为广义的人之所“作”，“事”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交融。丁立群讨论的是实践哲学的理论界定：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经历了实践的知识性内涵、实践的场域和实践的层次三重拓展；实践哲学归根到底是关于人文科学的哲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意义的哲学，是关于人的完整性的哲学。潘小慧主要讨论的是多玛斯实践哲学中的“艺术”之德和“明智”之德：多玛斯把德行分成本性之德与超性之德；本性之德可分为理智之德与伦理之德；理智之德分为思辨理智之德和实践理智之德；艺术是一种实践理智之德，而 *prudentia/prudence* 既是一种实践理智之德（明智），也是一种伦理之德（智德）。李萍试图以实践的视角超越元伦理学的分析方法与问题视域，结合中国传统中对“理由”概念的价值预设，从实践出发为“理由与价值何者优先”这个难题提出一套合理解决方案；实践不仅要求我们要再现自然事实，还要求我们触发相应的心灵机制，只有依托价值中介才能在实践中识别和回应理由。



第二组发言的也有 5 位教授：南开大学阎孟伟、武汉大学何萍、浙江大学张盾、西北大学张学广、清华大学李义天。阎孟伟强调，没有形而上学，就没有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的理性之维是形而上学中完全不依赖于经验世界的“纯粹理性”，它可以用于经验世界，但却不出于经验世界，而来自我们的理性能力，为我们提供逻辑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命题；这种理性之维存在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何萍试图对中国从上世纪 80-90 年代以来的理性作一反思，以便确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以及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实践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当代形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与中国哲学理性的变革；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与 21 世纪中国理性的建构。张盾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是现成的学说，它需要我们去建构；实践在哲学本体论上的规定是中介性和社会性，它主要表现为劳动、工业和科学等形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限度，比如实践的异化；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不会被超越，就仍然为我们的建构留有余地。张学广讨论的是维特根斯坦在现代哲学转向中对实践哲学的贡献，这尤其表现在他后期辨析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实践进行详细的语法分析，探寻哲学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引发了对哲学性质和方法的颠覆性理解，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哲学的“实践转向”的重要思想来源。李义天试图澄清、补充和完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这也与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化问题相关；他具体从实践智慧的特征、环节与运用三个方面展开，并特别考察了实践推理的原理，使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更加精细化和可操作化。



11月23日下午第一分会场的主题是“古代实践哲学”，两组发言分别由《哲学研究》黄慧珍编审与中山大学郝亿春教授主持。针对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是否成立这一问题，郝亿春教授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和布伦塔诺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资源，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回答。暨南大学刘钢教授从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无能这一判断入手讨论了实践哲学在当代所出现的自然主义转向，并进一步思考如何有意识地建构一种带有自然主义承诺的实践哲学。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王涵青副教授从比较孟子与董仲舒的“仁—义—利”结构之间的异和同入手，探讨了现代社会如何借鉴这些传统资源来思考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之可能性与动力的可行方向。西北大学刘宇教授强调，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所遗留的如何理解实践综合体的问题，在诗学中通过叙事对实践的模仿而得到部分的解决，保罗·利科通过发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其普遍化为实践的诠释学，使之具备了作为实践理性运用之方法论的潜在功能。中山大学郑劲超助理研究员探讨了斯宾诺莎实践哲学中“共同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德勒兹为“共同概念”所提供的后现代内涵，展现了斯宾诺莎在当代激进理论中的多幅形象。中山大学江璐副教授讨论的是实践哲学作为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她逐一分析了西方历史上哲学的二分法和三分法、哲学在历史上发生的词义和用法的转变、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划分。黑龙江大学陈莹副教授指出，实践哲学和实践科学在近代的区分有利于揭示实践的本质特性，并能更好地实现二者的融合，切实地体现实践作为人的意志实现活动的意义。韶关学院林蔚轩讲师以《荷马史诗》中的“正义”的多层内涵为例，讨论了荷马的实践之学及其特殊的呈现方式。中山大学覃万历助理研究员提出，柏拉图对修辞的批评切断了“知（知识）—说（言说）—行（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造成了“实践哲学”间离于实践，而走出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哲学思维应当重新接纳修辞逻各斯，去面对完整的逻各斯和不完整的现

实世界，重新回到“知一说一行”三合一的学术传统。



11月24日上午第一分会场的议题是“近现代实践哲学”，两组发言分别由《学术研究》罗莘编审与西南民族大学李蜀人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袁辉讲师根据康德晚期著作和遗稿中的观点反驳了“两种自由”的区分，并根据他的“实践三段论”理论证明，偏离理性法则的自由任性依旧试图依照理性法则行动，它只不过被貌似法则的幻相所误导。中山大学张广助理研究员指出，尽管批判哲学不能只被看作一个体系的说明，但它提供了一个道德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它应当被理解为一个道德主体的总体的说明和启蒙。清华大学博士生龚李萱强调，愉快是否具有意向性这一问题处于理解康德鉴赏判断的核心位置。她援引现代行动哲学对行动的意向性的分析来对愉快的意向性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华东政法大学张大卫助理研究员分析了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的空洞性指责，定言命令的致命缺点在于其形式化特征会导致伦理判断的相对化、偶然化，从而产生非伦理。华中科技大学王丁讲师指出，晚期谢林以“先行于一切思想”的“不可预思之在”取代了作为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存在”概念，把从前思想的存在向思想的过渡看作一种自由实践的结果，以此方式完结了德国唯心论，并在它的最后阶段过渡到了实践哲学。四川大学余玥副研究员强调，黑格尔的家庭法是一种包含契约论要素的商谈性规范，家庭是国家的“第二重根”；黑格尔的家庭学说中包含着效用论和幸福论考虑，它在当代被霍耐特用于修正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并更新民主实践。黑龙江大学高来源教授以杜威哲学为参照，论证了实用主义哲学思维的实践性的内在机理，这种机理主要表现为指号、意义与思维的实践逻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小虎讲师主要疏解和评论了海德格尔1924年冬季学期的亚里士多德讲稿；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是形式显示的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强调思想与行动相辅相成，知和行彼此结合。华中科技大学邵华副教授主要讨论了伽达默尔

的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它立足于当代历史处境，反思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实践合理性，批判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统治给人类造成的危机。



11月23日下午和24日上午的第二分会场主题均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其中，23日下午的两组发言分别由《哲学动态》贾红莲编审和华南理工大学李文美教授主持。吉林大学程彪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凸显了实践的历史性与自否定性，马克思由此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中山大学龙霞副教授深入剖析了马克思的目的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这一概念如何内在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里。南开大学侯振武讲师指出，实践理性既是整合不同理性形态的基础，又是不同于且优先于理论理性的理性形态，而马克思则以真正现实的实践哲学的方式深化了这种双重性。上海社会科学院谢晓川助理研究员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和评判，同时评议了马克思博士论文中“*Akkommodation*”的翻译问题。中山大学王兴赛助理研究员探讨的是黑格尔的“*Handlung*”概念到马克思的“*Praxis*”概念的转变，具体分析了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这两个主题词的内涵及其演替。中山大学谭群玉教授考察了马克思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广东省委党校胡志刚副教授指出，马克思否认存在柏拉图所指的作为本质的天赋，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来塑造的。华南农业大学谢翱讲师论证了马克思实践生存论如何继承并发展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中山大学李婷婷博士生指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里个人的伪出场与历史的强逻辑之间的张力。

24日上午第二分会场的两组发言分别由中山大学夏银平教授与华侨大学许斗斗教授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侯小丰研究员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在理论架构的核心、个人概念、对国家的基本态度、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等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异。黑龙江大学邓久芳博士生指出，

马克思实践哲学在研究内容和思维方式上超越了传统哲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刘习根副教授探讨了米塞斯行动学与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哲学基础、先验性与经验性、行为或实践动因上的差异。中山大学凌菲霞助理研究员总结了 21 世纪西方解释葛兰西哲学的分析范式和批判范式，并对比了两种范式的优劣。大连理工大学刘贵祥教授认为，科西克采用了一种“海德格尔—马克思互释”式的解读方式，他从批判实践概念的“三种变形”开始，创造性地揭示了实践概念三个向度及其特点。大理大学赵映香副教授回顾了 21 世纪以来中国实践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中的重大问题，并指出了徐长福教授和杨国荣教授等在元实践学上的原创性成就。深圳大学张守奎副教授梳理了台湾学者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学术渊源、理论定位、思想特质、具体内容和实践效果等方面的研究状况。中山大学刘晓雷博士生通过比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论》探讨了禁欲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23 日下午第三分会场的主题为“实践哲学的理论探索”，两组发言分别由《天津社会科学》赵景来编审与《江海学刊》赵涛编审主持。吉林大学王福生教授首先阐明了高清海哲学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到类哲学的发展，然后讨论了高清海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或不是实践哲学。南开大学王时中教授通过反向逆推的方法突出“实践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并为“实践哲学”建构一套可操作的方案。南方医科大学马万东副教授认为，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看，实践哲学应当成为继存在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诸形态之后的一种新的哲学阶段和形态，代表了哲学的发展方向 and 出路。西南政法大学吕春颖副教授指出，价值一元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成为现实，价值多元论承认并符合人类既定生存条件以及个体的多元化诉求，因而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中山大学叶甲斌博士生通过对象、

意识与语言等三要素，以语言分析方法考察实践的概念。武汉大学刘倬帆博士生认为，马克思通过指出语言的实践性和交往性本质来对既往语言理论进行了一次革命。中山大学刘畅博士生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实践学传统克服了现代西方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存在的不足，强调人类行为对人类理解和阐述世界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这样的实践学是反对还原论的。中山大学周宏胤博士生通过符号指谓的句法结构图解来探讨异质性哲学如何考察符号认识。



24日上午第三分会场主题为“实践哲学的当代课题”，两组发言分别由肇庆学院黎玉琴教授与中山大学吴育林教授主持。西南政法大学乔戈副教授主张马克思通过元伦理层面的反思达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规范性的逻辑自洽性。中山大学邓伟生副研究员分析了威廉斯的平等理论及其相关讨论，并指出当事人视角能为平等理论的辩护提供新进路。中山大学卢俊豪博士生指出共同善在实践中遭受冷遇的难题，并强调先天的共同体感与实践中的道德赋能乃解决该难题的重点。重庆大学的吕进教授探讨了萨特如何通过中介—整体化方法来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黑龙江大学的刘健博士生指出，哈贝马斯反思性地批判了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民主化的发展出路。四川文理学院文翔教授通过分析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关系来说明中、西、马三大哲学学科可以形成合力，推进中国现代实践哲学研究。中山大学杨玉昌副教授以抑郁症的哲学治疗为例，探索了“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实践。

11月24日下午大会发言的议题是“实践哲学的前沿”，分两组发言，分别由《哲学动态》贾红莲编审和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主持。



第一组发言的有 5 位教授，包括复旦大学孙小玲、安徽大学张能为、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中山大学马天俊。孙小玲指出，康德对实践与理论的区分缺乏清晰性与合当性，这使得从思辨到实践的路径与道德路径交织在康德著作中；依循《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路径，先验自由首先是个道德概念而非思辨的概念，是道德必要的预设，并仅仅在道德行为中获得其肯定意义。张能为指出，西方实践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伽达默尔的以解释学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既容纳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情境性行为选择，又包括了康德对普遍行为规范的形而上学思考；实践哲学以其高度复杂性或许会成为未来人类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并具有巨大的思想空间和意义。田海平教授首先讨论了实践哲学的问题域，比如做、知行关系、理论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关系、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等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应从切身性出发对上述问题域进行还原；除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外，儒家的仁性主义传统也应是实践哲学谱系中的一种，它主要体现在儒家的“志”伦理中。樊志辉首先界定了实践哲学视域下“实践”的具体指称；他然后讨论了实践哲学的能指，澄清了关于实践的哲学与基于实践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提出了一种后实践哲学，强调要走出实践的自我称义；最后他主要反思了人类实践得以可能的先验前提，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限制（边界），并进而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逻辑空间。马天俊试图对实践和哲学本身作一新的理解，具体来说就是在范式更迭的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对自在之物问题的了结：以“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为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力图扬弃哲学本身，使之回归能动的和感性的实践，这是一种范式转换。



第二组发言的也有 5 位教授，包括清华大学韩立新、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辽宁大学王国坛、华南师范大学尹树广、中山大学徐长福。韩立新强调，高清海 1995 年以后的实践哲学主要表现为他所提出的“类哲学”，一种真正以“劳动实践”为基点而展开的一元的“实践哲学”；高清海所说的类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而更接近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类”的规定。程广云以启蒙为线索梳理了中国自 1980 年代以来实践哲学的发生史并展望了新的实践哲学类型：新启蒙阶段，实践哲学表现为作为本体论和存在论的实践哲学；后启蒙阶段，实践哲学表现为作为形上学和语言学的实践哲学；再启蒙阶段，实践哲学应面向实践本身，其要点包括实践原子主义、实践情境和行为链分析、实践循环和动名词体系。王国坛指出当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没有解决人的发展问题，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乃至辩证唯物主义出发都未能指明历史发展方向，也未说明社会主义的来源。因此，社会主义问题需要进入到哲学领域之中加以谈论，而要处理上述两个问题就要注意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尹树广细致梳理和讨论了实践和实践哲学概念在西方古代、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的变化，并同时讨论了存在论与伦理学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概念的扩充与实践的心理学、实践的主体问题与时空概念等问题。

作为本次论坛的策划者，徐长福最后发言。他对自己为本届论坛所设计的主题“实践哲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说明，其要点是：实践哲学学科是各种实践哲学的私人学说进行公共交流和评价的学术平台；实践问题的整体性如今已被高度分化的学科所肢解，亟需实践哲学学科加以统观；中国实践哲学学科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直面并解决那些目前尚未进入学科研究视域却事关民族和人类命运的重大实践问题。

会议闭幕式由马哲所所长助理谭群玉教授主持，副所长马天俊教授致闭幕辞。

马天俊副所长通过解释本次会议的口号“求必要之同，存充分之异”来对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并代表主办单位向所有与会者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 实践哲学讲坛第 20 期综述

201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实践哲学讲坛第 20 期在锡昌堂 515 课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为辅仁大学潘小慧教授、尤煌杰教授，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李萍教授，评论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教授。本次讲坛的主题为“实践的善与美”。

潘小慧教授、尤煌杰教授指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追求“善”与“幸福”，与追求“美”与“美感”都源自人类理性中的实践理性。善的实践在于，人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致力于使人自身达成德行的圆满，透过实践理性与意志的欲求让人成就“卓越”。“美”的实践在于，人作为一个面向客体世界的制作者，致力于完成一个“作品”。“美感”即是作为观赏者的主体在面对某一对象时，透过实践理性与感性直觉让人体验到心灵愉悦和超越境界。在《论语》一书中，有两种意义上的善，第一种是一般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第二种是指称“善人”之善，也就是“道德主体”之善。《孟子》中还有第三种善就是指称“善政”、“善教”之善；第四种则是指“人性”之善，这也是孟子思想的创发处。孔孟之善都完成于“德行”。善的理解可以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作为本体论或存有学之善，其次才是伦理道德意义之善，儒学并借由人与诸存有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或满全来表现善。在中国哲学中，“善”作为德行或德目之一，并非最高的。

“美”是“充实”，就是说个体人格进一步将善人、信人所遵行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扩充到自己的容貌形色行为等各个方面。在中国美学思想中，有人与自然万物的审美关照，也有人与人的审美关照，亦有人与天的审美关照。在艺术的境界里，我们获得了与自然的感通之道，体悟自然，与自然之主客对立消弭了，感性之知与概念之知都被更高级的直观所超越了。随后，潘教授和尤教授回顾到，他们在个人的学思历程以及哲学的探究路途上如何接触到了实践哲学的基本观念。透过与同学们的对话，两位教授还分享了自身在道德境界与美感境界的追求中的知性与感性收获。

演讲结束后，潘老师、尤老师与在场的老师、同学们就善与美的界限与区分、实践理性是否是先验预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 实践哲学讲坛第 21 期综述

2019 年 11 月 21 日下午，实践哲学讲坛第 21 期在锡昌堂 515 课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为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徐俊忠教授，评论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本次讲坛的主题为“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范式的转换”。

丁立群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哲学有着内在的继承、超越关系。马克思以“劳动”“社会”和“人类解放”三个范畴转换了“伦理—政治”实践哲学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它以“劳动”作为普遍实践的原型，把传统实践哲学当作非人活动的劳动提升为人类普遍的本质活动，赋予劳动阶级以一种普遍的实践主体性，使实践不再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贵族活动；把实践由伦理政治领域转换到人类活动的基础层面——社会领域，拓展了实践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用社会解放代替了传统实践哲学狭隘的政治解放，使实践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与传统的“实践—政治共同体—人的政治本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不同，马克思构建了“劳动（实践）—社会共同体—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革命—人类解放”的全新理论。丁立群教授进一步解释到，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制作、实践第一次作了区分，使实践哲学从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截然不同，理论哲学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知识，其知识形态是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实践哲学是变化的人事领域的特殊知识，其知识形态是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永恒”和“必然”的问题即“神”的问题；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个人的完善和善治问题，即关于属人的善的问题。理论哲学追求的是普遍的“真理”；实践哲学追求的是特殊的“意见”，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亦称“真理”。其次，实践哲学和制作哲学也截然不同。实践哲学处于“人事”领域，探究的是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实践；制作哲学处于“物事”领域，探究如何依据自然的原理生产一种物品。实践哲学研究人的道德活动，重在于“行”，着眼于特殊性（特殊境况）；制作哲学重在按理性和原理操作的品质，重在于“知”，着眼于普遍性。实践哲学所谓实践理性（实

实践智慧)在于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把握和筹划对自身完整的善;制作哲学的理智作为一种技艺,目的是生成某种物体,属于局部的善。实践哲学所谓实践是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动,而制作哲学的制作则是目的外在于自身的活动。实践是无条件的、自由的活动;制作是有条件的、非自由的活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无论是从精神气质还是从思想场域,无论是从兴趣取向还是从终极关切,无不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密切相关。马克思的理论概念和实践概念皆来自古希腊,并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及其生长和完善的思想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不过,马克思通过对实践范式的重要转换,对实践哲学传统进行了一场革命。马克思用劳动代替了实践作为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使实践成为人类普遍的本质活动;转换了实践哲学的存在场域,用“社会”范畴取代了传统实践哲学的“政治”“伦理”范畴,拓展了实践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用人类解放代替了狭隘的政治解放,使实践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通过这种理论范式的转换,马克思构造了“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这种“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所主张的革命,就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而这种“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具有一种传统实践哲学所不具有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彻底性。

演讲结束后,丁立群教授与在场的老师、同学们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场的老师、同学们收获颇丰。

## 实践哲学讲坛第 22 期综述

2019 年 11 月 22 日（周五）上午，实践哲学讲坛第 22 期于锡昌堂 103 课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为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张伟教授，评论人为中山大学杨海文教授。本次讲坛的主题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基于‘事’的‘史’”。

杨国荣教授指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人与世界关系进行哲学说明与构建。世界的现实形态建基于人所作之“事”，人自身也在参与多样之“事”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并获得现实的规定，前者表现为认识世界和成就世界的过程，后者则以认识自我和成就自我为内容。以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视域，中国哲学中具有综合意义的“事”，较之单一的“物”“心”“言”，呈现出更为本源的性质；以“事”观之，也意味着从更为本源的层面理解世界和成就世界，理解人自身和成就人自身。较之狭义“实践”的认识论意蕴与“行”的伦理学内涵，“事”既展开于化本然世界为现实世界的过程，从而关乎本体论之域，又兼涉认识活动和道德行为，从而渗入了认识论与伦理学意义。作为广义的人之所“作”，中国特有的“事”哲学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交融。

人事主要是指人的活动以及这个活动所形成的结果，往来成古今则更多的指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上用古今来代指历史。以人事的代谢来说古今的变迁，这样的进路实际上隐含着人开创历史和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之间的一种关联。人事的代谢有多种形式，从经济、政治到军事、文化等，都可以看到人事的各种表现形态。如果离开了事，离开了人所展开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看历史，看待古今，那么古今就仅仅表现为一种空幻的时间流动。历史和人的活动是相通的，从历史的生成和演化过程来说，历史世界和本来意义上的物理世界的差异就在于，历史世界是通过人的活动创造的。本来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它的形成并不需要人的具体参与。人的活动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就是人之所做，它就表现为事。它既表现为个性化的活动，也展开为更广义上的内容。从个体层面上来说，个体所做的事要延续，成为个人的一个人生过程。在内容层面上，人事代谢则表现为一种前后绵延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个体不仅可以参与类的层面所做的事，而且个体

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个体所展开的事也在不同意义上内在于更广视野的类所做的事当中。另一方面，类的层面所展开的事往往也构成了个体所成的事的多样性的背景。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样看来，不仅仅是马克思提到，另一些哲学家们也有这样的看法。历史就是生成于人的所做与所为的过程中。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正是在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事”的多样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总是发生于已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理”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扬弃了“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源于人的参与和基于既成的“势”和“理”，构成了“事”和“史”的二重向度。“事”的变动和“史”的衍化，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不同的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事”有目的，“史”有方向，“事”无止境，故“史”无终结。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演讲结束后，杨国荣教授与在场的老师、同学们进行了讨论交流，同学们收获颇丰，讲坛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 精彩互动

**杨海文：**杨老师今天的讲座视野极其地广阔，环环相扣，逻辑十分地清晰，尤其是哲学的气场十分浩大，让我们深受教益。我的点评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第一个方面就是就杨老师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从三个高度做一个点评。另外我也想提出三个问题向杨老师请教。第一个高度，我觉得杨老师今天的讲座体现了实践哲学的高度。杨老师今天的讲座就把做哲学与做事情密切地关联到一起了，而实践，就是做事情。第二个高度，是哲学创新的高度。杨老师的讲座今天既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故知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创新。杨老师今天的讲座提到了四个概念：事、史、理、势。这四个概念能够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一块，这是哲学创新的鲜明的体

现。第三个高度是世界哲学的高度，杨老师今天的讲座让我们对地方性知识和世界性知识两方面都有了了解。杨老师认为，我们做事情是有目的的，而历史是有方向的；我们做事情是没有止境的，而历史也是不会终结的。这个观点恰恰就是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观点提出来的。所以杨老师的观点是站在了世界哲学的高度来讲的。下面我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提出三个小问题向杨老师请教，第一个问题是，做事情有做大事的，有做小事的，我们看历史看大事看得多，这个大小之辩在历史过程当中究竟该怎么体现？第二个问题，积极与消极之辩。我们通常认为做事情是很积极的，但我们也常常讲到做事情不要太过分了，这么的话，从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来看，我们是不是一直要不停地做事情，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在做事情的时候要适当地停下来一点。第三个问题，如何做到事事无碍的环节？当我们在关注历史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确保一个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彼此之间都是相互没有障碍的？

**杨国荣：**谢谢海文老师的问题。小事和大事之分也没有一个恒定的尺度，根据机遇、偶然性而起作用。小大之辩和历史的偶然性，以及个体在历史当中的作用，这些点都是纠缠在一起的。总得来说我们承认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也承认偶然性因素的作用。有些开始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一夜之间在历史上做了伟大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历史过程总体看来虽然是类演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也是个体的成果。这里涉及到类和个体的过渡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就是在二者的交杂之间形成的复杂过程。第二个问题其实从老子开始就有在讨论，历史的过程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历史的复杂性，这个过程我们要辩证地去看。第三个问题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最好状态，从现实的生活来看，在相当时期内我们的个体差异都会意味着利益差异，而且会带来冲突。所以对于我们的现状来说，是一个要不断去争取去实现的目标。从调节、规范的角度来讲，事事无碍这个观念可以用来调节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某同学：**杨老师您好，历史过程中的势和理有自身的存在形态，它不能化约为物理世界的维度，物理世界以因果必然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它是自然生成的。我想问的是，人的意志在生物学方面可以用脑电波的运动来解释的，那如果说历史过程中的势和理有自身的存在形态，它的存在形态以必然性和偶然性作用于历史形成历史的话，那总体来说它背后应该有一个道和理，而物理世界似乎也是有

这样一个背后的总体的理的存在。那么物理世界的理和人类世界的理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有同一性呢？如果没有同一性的话，那人也是一个物理的存在，人性是否会有两个层面呢？一个事实层面一个规范层面。还有人性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杨国荣：**人是具有多方面性的。人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生物性存在的，他当然也要受到生物规律的制约。人确实有他和其他对象在生物学物理学层面上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和动物是有区分的，人性就是人之为人的特性。人的不同于动物性、不同于一般的物理世界中一般对象的特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和价值性。这些特性是心理学实验、生物学实验测不出来的。人的思维的机能和现实内容是不同的，人天生地可以看，可以听，可以思考，但是要看得清楚，可以分辨不同的对象，思维要达到类知的层面，不是光靠生理机能可以完成的。这也是人不同于动物的一点。人具有实现自由的本性，可以摆脱内在的感性冲动的支配，这也是其他一切物理对象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独有的特性。

## 实践哲学讲坛第 23 期综述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实践哲学讲坛第 23 期在锡昌堂 420 课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为武汉大学哲学院何萍教授，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谭群玉教授，评论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本次讲坛的主题为“实践哲学研究的开展与 21 世纪中国理性的建构”。

何萍老师从中国实践哲学研究的三次范式转换讲起，描绘出一幅中国理性的 21 世纪建构图景。何萍老师指出，1949 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科学理性向历史理性的转化。这一转化经过了三个逻辑环节：第一个逻辑环节是学术结构的变化。在这个环节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根据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建构了一个融认识功能、价值功能和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学术结构，从而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理念。第二个逻辑环节是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在这个环节上，通过对认识的主体性、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框架。他们通过对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关系的批判性反思，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破除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式的研究体系，创造了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格局。第三个逻辑环节是历史理性的建构。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现代性批判，建构了以当代文化为内核的历史理性，从而表明，中国的理性已经超越了那种以物质技术为基础的狭隘的、单向度的科学主义的近代哲学观念，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这种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就是 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

演讲结束后，何萍老师与在场的老师、同学们就苏联模式的实践哲学的利与弊、中国理性未来的去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场的老师、同学们收获颇丰，讲坛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 精彩互动

**马天俊：**非常感谢何老师。限于学力也限于时间，我不能讲太多内容。今天是实践哲学讲坛第23期，这个讲坛大多数我都参加过，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这是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一次学术报告。第二点，何老师今天的这个报告是基于她过去的长期积累，是一个蔚为大观的一家之言。何老师谈的这个这个问题我认为既聚焦了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涉及到重大的观念史问题，因此我们也就以学者的方式来涉及了重大的现实问题。何老师您在这些方面有若干重大的学术判断，这些判断关涉到我们整个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的既陈旧又新颖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很多同学也都会或多或少涉及过，但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严肃地清理过。因此，您的报告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示范，具体内容有些完全是在我的学习范围之内，所以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上了一课。最后我想说这么一点，我们这个研究所的名字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您今天的报告刚好把这个研究所、这个基地的名字里面两个方面的东西融会贯通了，因此，这也将是您馈赠给我们基地的一份宝贵的荣誉。

**徐长福：**何老师，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的感受和大家是一样的。非常遗憾的是，我过去没有听过您这样作报告、这样详细地讲您的观点，有一种恨晚的感觉，今天我可以说是认识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何老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向我们的所长李萍老师提议一下，让何老师来我们这里担任课程老师，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让何老师能够分批次地给同学们讲讲她的想法。

##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23 期综述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23 期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晚在锡昌堂 420 室举行，本次由 2018 级博士生饶琳同学领读，阅读文本为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团结，还是客观性？》（Solidarity or Objectivity?）。

饶琳指出，该文章主要阐发实在论对实用主义提出的相对主义质疑，以及在对普特南的批评基础上对实用主义所做的辩护。首先罗蒂提出，在人类自身形象的反思形式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追求客观性，也就是将人类的团结奠基于客观性，支持这一方式的是实在论者；另一种是放弃客观性追求，将其还原为团结本身，这一方式的代表是实用主义者。针对实用主义者放弃客观性标准的方式，实在论者提出了相对主义的质疑。针对这一质疑，普特南所作出的辩护是在放弃外在客观标准的前提下，将这种标准以普遍的交往方式或不断地重构信念的方式建立在概念内部。罗蒂认为普特南的“内在论”最终还是陷入了一种超历史的科学主义之中。罗蒂认为要真正避免相对主义问题，在于转换问题提出的方式，相对主义是建立在当下西方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之下，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概念的分析而获得解决。而事实上，当下所有西方理性科学主义对自身的理性辩护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由此，实用主义本身并不能基于相对主义而获得来自实在论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毋宁说是基于种族中心主义。但在本质上，实在论也是种族中心主义的。

讨论环节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罗蒂针对相对主义提出的辩护的有效性，即如果放弃从概念上入手，避开实在论的问题领域，相对主义是否就会得到解决？事实上，按照罗蒂的观点，实用主义所面对的来自实在论的相对主义批判只能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所根源的实在论及其思维方式属于西方文化或者根源于 19 世纪以来西方启蒙理性。罗蒂将这种相对主义局限于西方种族内部加以辩护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其将面对来自种族外部相对主义的批判，这种相对主义不仅仅来自西方文化，还是一种跨文化的文化冲突，因此并不能通过放弃对跨文化价值的追求或坚持种族中心主义来解决。

第二个讨论的问题围绕放弃这种客观性追求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来反思罗蒂

对实用主义的辩护。事实上，在哈贝马斯或者普特南看来，追求一种实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中间道路是有必要的，其一方面需要反对实在论以客观性追求而导致的超历史的“绝对”，同时也要反对由相对主义所带来的事实上的文化霸权。按照罗蒂的观点，在逻辑论证上，它们都最终陷入前一种观点的陷阱，但事实上罗蒂放弃后一种观点也就意味着陷入后一种的现实困境。罗蒂是站在西方或者更确切说是美国至上的文化优势上来做出这样的论证的，其实用主义的中心也就是种族中心主义，它虽然坚持了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但无法避免事实上的文化差距，这种差距最终必然使得这种建立于文化平等基础上的实用主义成为虚假性的东西。

##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24 期综述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24 期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 420 室举行，此次读书会的阅读文本是平子友长教授的《物象化与物化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由邓伟生老师主持，2018 级博士生施娜同学领读。

施娜指出，这篇文章一共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现代市民社会颠倒的结构，第二部分讲马克思物象化和物化学说的逻辑结构。第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平子先生抛出来了一个社会现象，然后他在第二部分中用理论去解释和分析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第二部分中，又有 6 个小点。首先，平子先生将马克思的经济学三位一体结构引出来，因为该结构可谓是物象化论的一个缘起，是最初引发马克思去思考物象论的一个问题。第 2 点和第 3 点可以看作是对第 1 个问题的一个回答，第 2 点其实讲的就是物象化，第 3 点讲的是物化。第 3 点也是平子先生跟广松涉的观点最不一样的地方。广松涉只指出了物象化，也就是说，广松涉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三位一体这个问题，其背后的本质问题是人向事物颠倒，这个也是物象化的原因。但是平子先生则认为，在物象化之后还有一个物化。也就是说，物象化还不是最终原因。第 4 点和第 5 点其实是对第 2 和第 3 点的具体体现。比如第 4 点，在广松涉那里，如果追究经济学三位一体结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的话，广松的回答就是物象化，就是商品拜物教。但是平子先生认为，物象化之后还有物化，就是这个物象化所体现的主体间性，在商品中所体现的这种主体间性其实最终还有一重关系的体现，即货币。商品在流通领域通过货币这个等价交换的形式来体现它的价值，所以货币也要体现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平子先生认为，最后的阶段应该去到物化，走向货币拜物教。最后第 6 点就是这篇论文的一个落脚点，论述的是马克思用物象化和物化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跟黑格尔的逻辑学有什么样的联系。

大家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思想受到黑格尔很大的影响，因此黑格尔的一些观点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有某程度上的联系的，马克思也是从关系这个角度切入分析经济学三位一体结构的，那么，这个批判的方法跟黑格尔逻辑学具体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10 期综述

2019 年 12 月 11 日下午，第 10 期异质性哲学研讨班在锡昌堂 420 室如期进行。本期研讨班共研读了四篇论文，它们都来自徐长福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探索》一书。

施娜领读的是“马克思的宗教观及其当代省思——为 2005 年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而作”一文。该文首先将马克思的宗教观的主要内容有逻辑地提炼出来，接着，文章揭示了马克思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出他的宗教观，也就是说，马克思提出他的宗教观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什么现象，他要解决什么问题。最后，文章得出结论认为，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所针对的问题也不仅是宗教问题本身，所以马克思的宗教观必然带有不纯粹性。不管是马克思用以批判宗教的理论前提，还是他所采用的批判的方法，都有失偏颇。同学们讨论的问题是：宗教内部是否也有一些不可还原为政治的一些东西？

罗丽芳领读的是“论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一文。该文尝试系统阐释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并顺带探讨这一思想跟马克思本人的做法、跟后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跟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向的基本关系，并希望由此可以开启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视角。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同学们讨论的问题有：应该用什么来取代哲学，使我们能够认识世界？

刘畅领读的是“求解‘柯尔施问题’——论马克思学说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一文。在本文中，文章首先梳理了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和“科学”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发生了什么变化，直至现代人们又是在何意义上使用“哲学”、“科学”概念的。其次，文章分析了马克思思想中有哪些不同的成分。最后，文章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学说中本来就既有哲学的成分，也有科学的成分，马克思把自己的学说自诩为“科学”的做法是有一定问题的。同学们讨论的问题有：

西方传统的、古希腊的求真的知识观，为何一定会导致对语言、数学、逻辑的重视？

饶琳领读的是“认知先于修辞——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观的核心原则”一文，文章强调的主旨是，认知先于修辞。文章梳理了该主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源发意识形态观点中的展现，以及这一核心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探索以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上的重要意义。首先，关于认知先于修辞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存在着一个从“认知先于修辞”向“修辞先于认知”的这样一个转变。在前一个原则之下，理论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揭露真理、发现真理，修辞服从认知的需要；后一个原则则是以语言的修辞为核心，理论成为工具性的和服务性的，一切理论都成为意识形态，理论失去了认知真理的功能。同学们讨论的问题是，是否所有普遍的符号意识都是意识形态？

## 郑劲超岭南青年哲学沙龙报告综述

2020年5月27日下午，中心成员郑劲超助理研究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岭南青年哲学沙龙系列活动中作学术报告，题目为《法国异质性哲学的谱系》，报告主持人为马天俊教授。

郑劲超博士的研究以徐长福老师的异质学哲学为契机，试图对异质性哲学的谱系进行一种梳理。英文中的“异质性”一词来源于它的形容词 *heterogeneous*，它往往出现在比较学术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话语之中，它由两部分构成，即 *hetero* 和 *geneous*，前一部分表示“另一个，两者中的一个”、“另外的”、“另一样的，不相同的”、“另一方面”等意思。后一部分表示“氏族，家族”、“后代，子孙”、“种族，民族”、“世代”、“性别”以及生物分类意义上的“属”，而它们合起来有又表示不同种类、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甚至表示不同材料的衣服。因此，即使我们把 *heterogeneous* 比较直接地译为“异质”，它的含义也会产生许多误差，而这种误差能够为我们思考西方哲学提供了独特的空间，也就是说不是用我们一贯以来的思维秩序去理解某个名词或语法，而是重新思考该词语起源的所有可能性，重新思考这一词语乃至这种知识是在何种历史和空间中被构建起来的，用福柯的话来说是一种考古学或谱系学的方法。

郑劲超博士的报告主要分三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探讨的是异质性最初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是如何被讨论的，这构成了西方哲学讨论异质性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第二部分探讨的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来的这条线索被纳入到海德格尔的思想之中，以及德里达、德勒兹和利奥塔等人如何对这条形而上学的线索作出反思，第三部分探讨在这条形而上学批判的线索之外，法国异质性哲学如何在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中产生了新的思想成果。

### 精彩互动

**马天俊：**你怎样思考、怎样估量异和差异之间的关系？

**徐长福：**谢谢天俊老师的主持。对于博士后出站以及后续转聘的年轻老师来说，这样一种学术报告的形式非常好。劲超专门整理出异质性在法国、德国思想

界的思想谱系，这据我的了解是没有人做过的。而且出站报告做得非常严谨，比较可靠且细致，非常难得。劲超抓住了柏拉图通种说的两个关键词并和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做了比较，这是抓住了要点。柏拉图中期的理论还是以理念、相(eidos)为主，相其实就是一个类，每一类都有一个典型的模型。但是这样一来类就太多了，而且还会有坏的事物的类。这些类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类和个体是什么关系？柏拉图的整个对话就是探索的过程。实际上所谓的类就是句子的主谓结构的谓词。为什么个体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谓词来陈述呢？如果每个相都是绝对的话，它们怎么能够组合到一起来说一个对象，一个个体呢？柏拉图后来提出“通种说”，就是柏拉图提出了五个更大的类，作为外延更大的谓词。譬如动、静、相似、不相似等更抽象的谓词。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两种类就变成了逻辑的术语，相不再是作为理念被定位，而是作为属(species)，相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外在的模型，属则是一个逻辑学上的术语。大的genos就变成了一个大类，叫做种。亚里士多德对种也分出了很多层次。最高的种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通种。最抽象的种是不能通约的最高的种，至少分成两类，即实体和偶性。异质性的质就是从genos来的，为什么会异，就是因为种在最后化约之后还是多的，不是“一”。所以异质性也可以叫做异种性或者异类性。这是我对劲超报告的一个补充说明。黑格尔和马克思、海德格尔都是要找到最终的东西，要找到一个“一”的东西。异质性哲学的根本创意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虽然有最高的“一”，但是它是类比的“一”，不是真的“一”，不是实在的“一”。实在的部分一定是多，所以一定要区分开讲实体就是实体，讲偶性就是偶性。不能说实体和偶性都统一于being，那样是说明不了问题的。亚里士多德还从逻辑上论证了这个道理。所以异质性哲学是从亚里士多德开显出来的。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是寻求一个“一”，什么东西都要从“一”中来，要统一到“一”中才算数。法国从大革命开始就反抗这个“一”，所以他们对异质性特别有体会。

**郑劲超：**关于类比意义上的“一”和实在的“多”的关系，徐老师讲得很清楚了。关于异质性的思想资源到底是怎么发掘的，我在想这真的是一种考古学的东西。异质性首先是一种复合的词，它的拉丁语化以及进一步的英语化、法语化是很晚的事情，可能在16、17世纪以后。所以这有点像寻找族谱、家谱的感觉。马老师提出的问题，“异”和“差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两个词语，在他看来，

我们有“同”作为基础，才能谈论“差异”。但“异”是很难被讨论的，因为它不能被化归为同一种东西，也不能相互融合。所以“差异”是后来包括在海德格尔那里谈论得比较多的方面，因为海德格尔特别重视这种共存性的、超越性的东西。

**马天俊：**我想到一个问题。20 世纪的思想大概多多少少受过马克思的某种影响。关于异质性的论题，马克思主义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贡献？也许是因为这一点，法国这些学者多少对马克思都有一点重视。如果是纯粹的异，其实甚至很难进入言说，换句话说，我们一张嘴说话，大概就带来了同一性——不管它是在实在意义上的或是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马克思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贡献，就是接过 17、18 世纪的启蒙的或者说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来说，并干了一件事情，让 19 世纪乃至整个 20 世纪的人都感到共鸣甚至不安。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如此理性化的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生活其实有其根深蒂固的对立。这个对立不仅是思想的问题，譬如阶级斗争，它看起来都似乎是在一个统一的现代建制下进行的，其实却有着根本的分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是在揭示一系列的分裂，譬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分裂，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分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似乎在 19 世纪理性主义的氛围里做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人们一般意义上认为同的景观里面，他重现了若干非常重要的差异，或者分裂、冲突。这些分裂直到今天都是大问题。也许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这个充满了哲学教养的人在去看现代社会的时候，他有对“异”的特别重要的揭示。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这种启发当中。与此同时，马克思身上又有浓重的黑格尔遗产，我部分地赞同徐老师刚才说的，在异质性哲学的景观里面黑格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实实在在地主张一个“一”，刚刚徐老师也点出来过，这个和基督教有关系，也就是一切出自上帝，而上帝绝不是一个类比的问题，而是一个比一切真实者都更加真实的，一切真实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呈现了多少差异，伴随其间的仍然有一个同。马克思不管揭示了多少关于现代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在他思想的总体上仍然假定了并且在未来期待了一种所谓的人在类的意义上的解决。也即，还是有一个将来能够达成的“一”。那些看似不可调和的差异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要素。20 世纪法国的思想家们，都致力于揭示差异，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也许也是法国当时的社会进程已经比较稳定地达到了一种现代的建制，这个建制并不是异，而是

同。在这个同的平台上，正是因为同的平台足够稳固，足够有弹性，以至于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更加充分地去追求他们的异。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更加充分的个性化的发展，那么他们这种各成一家之言刚好是现代社会本身的一种成就。进入现代，人格独立，个性发展虽然还不完美，但这也是在此前的历史上很难呈现的现实的成就。我认为，讲再多的异，如果把同撤销了，那么万物都要消散。所以，差异的彰显总归要在背景里面要有最低限度的同，这些同还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而是历史进程所达成的。所以事情也许是双重的。

**郑劲超：**我很认同。历史实际上还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不是说把不可通约的东西呈现出来就把它解决了，还是要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才能把这些“异”解决了。太过于追求差异的法国思想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碰到了很多困难，这也是他们的经验和教训。

**王兴赛：**我想请教劲超一个问题，利奥塔提到，对于黑格尔把差异融入到同一当中的做法马克思有一个批判，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有些疑问，涉及到黑格尔辩证法的中介问题，不知劲超可否再详细地展开一些。

**郑劲超：**利奥塔举了一个例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讲等级要素的时候，马克思的论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一字一句地摘录，而是大段大段地展示自己的观点。为什么等级要素会让马克思有如此强烈的想法，这里的等级要素指的是一种介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会议制度，它是有市民社会性质的，而黑格尔在谈中介的意义的时候还是把中介归向于国家，而把实际的、实在的社会的矛盾看做琐碎的东西，看做人性的贪婪或者私欲的表现。马克思却发现这种中介实际上是社会矛盾能够真正对于整个国家同一性提出批判的中间环节。在黑格尔那里，具有调和意味的等级要素在马克思那里变成了具有批判性的地位。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两面的做法，实际上没有把具体的差异解释出来，而是转化为了抽象的内在的矛盾。

## ◆成果摘要◆

### 《实践哲学评论》第四辑“编者的话”节选

《实践哲学评论》自出版以来就非常重视对中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深入发掘和研究，本辑第一个板块的5篇文章都是对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重要思想比较和诠释，其中前3篇探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理解与发扬。

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比较研究是实践哲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借用意大利学者伏尔皮的话来说，“要想准确地理解海德格尔，就必须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对于海德格尔哲学之形成的重要意义，而这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当代价值”。马小虎和伏尔皮的文章探讨的都是青年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讲解与阐释，伏尔皮处理的是海德格尔1923年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第5章“实践智慧”的诠释，马小虎处理的是海德格尔1924年冬季学期的亚里士多德讲稿，这一讲稿被认为是“海德格尔阐释亚里士多德的真正代表作……影响了一代人，包括阿伦特和伽达默尔，引发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复兴”。马小虎强调，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乃是形式显示的实践哲学。伏尔皮的结论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之间具有同构关系，良知与实践智慧的对应关系也应在这一框架下来理解，《存在与时间》乃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现代改写版。美国学者布朗在《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潜能高于现实》中着力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9卷中关于潜能与现实的关系的论述以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二者关系的倒转。

德国学者里德尔考察的是黑格尔如何通过批判地继承近代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的经院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批判而一步步形成自己独有的“实践哲学”，即客观精神学说，并着力回答了如下问题：黑格尔用客观精神学说取代实践哲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概念的转变在历史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黑格尔只有在其哲学发展相对较晚的时候才会形成这个概念？

意大利学者扎巴拉针对的是当代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派别，即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他试图提出一种不同于伽达默尔对话式诠释学的新理路，即以无序性

为本质、作为差异化解释的可能性的诠释学，它不仅仅是革命性的，而且是一种通向反抗、改变和变化的思维方式。

“名家专论”板块包括与身体有关的两篇文章。自福柯作品问世以来，身体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耶鲁大学著名的早期基督教史学者马丁的文章就明显受到福柯的影响，该文是作者 2018 年在中国所做的系列讲座“肉体的发明”的第 1 讲，主要从观念史和文化史方面讨论古希腊罗马传统与古犹太传统中的“肉体”（sarx）观念，为后续讨论早期基督教的保罗传统、“路加”传统以及教父著作中的“肉体”观念提供了一种参照系。澳大利亚学者麦克利恩则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讨论身体的治疗与死亡问题，即主要从伦理与法律方面讨论安乐死问题：某些特定的安乐死行为是否是道德上可允许的？医护伦理学对于安乐死应该采取什么一般性态度？法律应该对安乐死持何种态度？

“经典译述”板块选用的是美国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与社会科学家萨姆纳的《重造世界的荒谬企图》。国内对萨姆纳及其思想的研究似乎还不多，但其著作等身，在国外久负盛名，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关于重造世界之说（可看作改造世界主张的一种较强版本），在西方思想史中屡见不鲜，相关的辩驳似乎也不少见，本文基于美国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重造世界的学说做了富有洞见的批驳。

“旧作新读”板块是《实践哲学评论》第 3 辑新开设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摘编我国现当代时代烙印较深的一些文献，“使它们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为读者创造一个‘旧作新读’的契机。”本着这一思路，本辑摘编冯友兰在 1975 年出版的《论孔丘》一书。正如摘编者所言，冯友兰“其学术人格既是时代和处境的产物，也是他自觉实践的结果……他以 80 岁高龄积极参与时论，出版《论孔丘》一书，给自己的为学为人再添浓墨重彩。虽然时过境迁，但变中还有不变的东西”，重读这一产生于特殊年代的著作，“推人及己，或许会别有感悟”。

“异质性哲学园地”是《实践哲学评论》的特色板块，不仅致力于阐释和拓展徐长福开创的异质性哲学理论，也非常重视学界对该理论的批评以及对中外相关理论资源的发掘。本辑的前两章就是后一方面的佳作。高申春的《感性直观确定性的迷信及其消解》是其在中山大学实践哲学中心举办的“异质性哲学对话”第 1 场中的发言整理稿，专门针对徐长福的书稿《异质性哲学要义》第 2 章“直

观认识和符号认识”（该章作为独立论文已发表于《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郑劲超的《法国异质性思想概况》是作者在本中心举办的“异质性哲学工作坊”第1期中的报告，主要回顾和阐释异质性思想在法国近代哲学与当代人文科学中的发展状况。后两篇文章是运用异质性哲学的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韦雅纳分析的是微信公众号发展中存在的同质化合模式化问题，杨文磊以共享单车为例来分析共享经济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差问题。

“哲人心路”是本辑新设的一个板块，旨在展示国内外著名学者对其学术实践的回顾，体裁不限。在过去的几年里，本中心有幸邀请到复旦大学的黄颂杰先生和英国肯特大学的赛耶斯先生就相关话题进行分享或座谈，本辑两篇文章均由两位先生的谈话整理而成。两位先生年龄相近，专业相同，但所处国家不同，志趣有异，所以人生和学术经历差别很大。透过他们各自的回顾，读者在比较中或许会别有一番感慨和收获。

“批评和对话”是《实践哲学评论》的常设板块。本辑延续前3辑的良好态势，继续发扬真诚辩论与对话的精神。

前两篇是上一辑“批评与对话”板块的续篇，分别是于幼军在2015年10月31日“第二届中外实践哲学对话”活动中的论文以及麦克莱伦与于幼军进行讨论的录音整理稿。于幼军从民主的主体、人民主权的实现方式、民主的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继承和超越。麦克莱伦与于幼军就历史的进步性、自由与平等、西方民主的历史等方面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第3篇和第4篇主要围绕朱学平的新著《从古典共和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早期政治批判研究（1839—1843）》展开评论与回应。乔戈主要针对该书中存在的“古今之争”视角或思想框架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两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争论是是否承认现代个体性原则的“古今之争”，还是一种为了克服现代“个体之间的分裂与离散”而设想的“路径”之争？

最后两篇都是对吴彦著作《法、自由与强制力：康德法哲学导论》的评论。两位评论人都充分肯定了该书在改变学界康德法哲学研究现状方面的学术价值，并都针对该书所强调的康德批判哲学的政治性阐释以及法权学说独立于道德哲学等观点展开了详细评议。

## **Xu Changfu: “Should the People’s Consent Be the Basis for Serving the People?”**

文章指出，1917年2月，俄国爆发革命，推翻了沙皇体制，随后各派达成了召开立宪会议以决定国家未来的共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并承诺如期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列宁表态若败选就交权。同年11月12日，约占选民人数一半的近4,500万选民参加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布尔什维克只获得约25%的选票。为了避免交权，布尔什维克于立宪会议开幕日，即1918年1月5日将其强行解散，并武力镇压了各种抗议活动。列宁的理由是：民主和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的肮脏衬衫，专政和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的整洁衣服。对此，考茨基却斥之为“背信弃义”，主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政府在普选中失败，它究竟是应该服从人民的裁决，还是应该为保持政权而扼杀民主？换成中国式的说法就是：为人民服务是否应以人民同意为前提？这场争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执政观的两条相反的道路，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改革富有启示意义。

## **王兴赛：《从黑格尔的“Handlung”到马克思的“Praxis”》**

文章指出，通过主题词研究法，黑格尔的“Handlung”与马克思的“Praxis”之间的演替过程能够得到清楚呈现。“Handlung”在黑格尔客观精神理论中被主题化，它在道德领域指道德意志或主观意志的外显，在伦理领域则既包括市民社会中具有特殊性和中介性的劳动，也包括政治国家中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行动。

“Praxis”一开始被马克思主题化为理论的现实化和世界化，后来它尤其被理解为一般劳动和革命。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中“Handlung”向“Praxis”的演替背后是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体现出社会化劳动生产的巨大威力，它支配着包括道德行动和政治行动在内的一切方面，同时引发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革命。

## **徐长福：《“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的辩证法》**

文章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形态的政治哲学发生于《黑格尔发哲学批判》。在该书中，马克思用德文词“Material”和“Staat”组合出了“Staatsmaterial”和“[der]materielle Staat”两个新术语，可对称地译为“国家物质”和“物质国家”。马克思将“国家物质”与“国家理性”对举，反对黑格尔由君主代表国家理性而人民单纯充当国家物质的君主制，主张国家理性要从人民这种国家物质中生成。进而，他把人民的物质生活领域称为“物质国家”，并与“政治国家”对举，反对各种现代国家制度把“政治国家”当作“物质国家”的单纯形式，主张把“物质国家”的内容上升到“政治层面”，基于“物质国家”去重构“政治国家”，从而实现彻底的民主制。“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的这种辩证法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初范式。

### 郝亿春：《“意志”缺席？“谁”来负责？》

文章指出，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 林进平：《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何以是“马克思主义的”》

文章指出，一种正义观之所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二是蕴含着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的价值立场。二者必须兼而有之，不可偏废。由此可见，不论是 R.G.佩弗代言的“罗尔斯式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还是 G.A.柯亨偏废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的正义观”，抑或 A.伍德着力论证的无涉价值立场的“马克思的正义准则”，都不可能是马克思

主义正义观。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从根本上说是唯物史观的思维方法与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的辩证统一。

### **梅谦立：《康熙年间两广总督石琳与法国船“安菲特利特号”的广州之行》**

中心成员梅谦立教授在《学术研究》2020年第4期发表文章《康熙年间两广总督石琳与法国船“安菲特利特号”的广州之行》。文章指出，据伯希和的研究，中法关系始于1698年“安菲特利特号”首航广州，由此开启了两国的贸易关系。然而，在“安菲特利特号”航行广州期间，法国耶稣会士对广州体制提出了挑战，目的是为法国公司争取优待政策。两广总督石琳给予了适度的支持，但最终还是要维护广州体制。本文基于大量法文相关文献，介绍并分析了在广州贸易体制形成初期总督石琳、粤海关及法国耶稣会士与商人各方势力的博弈。

### **林进平：《析“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伍德式阐释及其缺陷》**

林进平教授在《学术研究》2020年第5期发表文章《析“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伍德式阐释及其缺陷》。文章指出，“马克思与正义”论题源于罗伯特·塔克的“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论断，经艾伦·伍德的进一步阐释，被学界合称为“塔克-伍德论题”。伍德的阐释虽是对塔克论证的完善，却未能克服其内在紧张：一方面指认正义的意识形态特性，论辩马克思对其拒斥与批判；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诠释马克思的正义标准，并以之论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伍德阐释的不足在于抽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它反映了英美激进左翼学者在马克思文本理解上的教条主义倾向。这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要警惕的。

### **林育川：《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系》**

中心成员林育川副教授在《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发表文章《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系——兼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特质》。文章指出，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正义理论通常将分配平等作为其主要的理论诉求之一：无论在自由主

义左翼学者如罗尔斯、德沃金、戴维·理查德等人的正义论中，还是在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如 G.A.柯亨、佩弗、罗默尔、凯·尼尔森等人的正义论中，分配平等都被置于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在杰弗里·雷曼和戴维·米勒等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传统中真正关注的是社会平等而不是分配平等，前者主要是一种地位的平等，后者则是财富或者其他社会益品的平等分配。尽管这一主张总体上契合马克思对采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个体的平等权利的批评态度，但由于清晰地界定社会平等的概念并非易事，而且社会平等又总是以某种程度的分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平等和分配平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晦暗不明的。因此，通过进一步阐明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切点之差异，探析二者的内在关联性——是替代性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理论特质。

### **胡志刚：《康德主谓关系思想的批判性分析》**

中心成员胡志刚副教授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2期发表文章《康德主谓关系思想的批判性分析》。文章指出，在前批判时期，康德认为判断中的主谓关系必须遵守形式逻辑才能确定真值，真值是主谓关系的形式规定。在批判时期，康德通过注重非本质谓词，使得先天综合判断得出的知识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同时又具有经验来源。康德在前批判时期没能摆脱实体主义的影响；在批判时期，康德形式地运用范畴架格来对判断进行分类，但这些范畴的内容是空疏的，范畴的数量也不确定。康德的先验逻辑始终把谓词作为一种属性或偶性来解释和说明主词，他没有深入到主词和谓词相互转化的内在机制中去，因而不可避免会陷入二元论。

### **胡志刚：《黑格尔主谓关系思想的批判性分析》**

胡志刚副教授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发表文章《黑格尔主谓关系思想的批判性分析》。文章指出，黑格尔认为不存在始终只能作主词的实体，他拒绝把实体看成不变不动的基体。实体即主体就是主词即谓词，只有以概念思维中运动着的主体取代形式思维中不动的实体，主词和谓词、实体和主体才能实现差异的同一。主谓颠倒的关键在于“是”成为“是起来”，

即判断的系词“是”转变为动词“是起来”（be 成为 to be），这样才能展开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的、先验的推演。黑格尔主张实体即主体，目的是论证自由何以可能，他把“纯存在”作为世界产生的逻辑起点，把概念等同于对象，黑格尔没有把握到感性的、现实的活动对于实现自由的重要性，他的自由只是概念的自由，不是现实的自由。

## 张守奎：《马克思对道德虚无主义的超越》

中心成员张守奎副教授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马克思对道德虚无主义的超越》。文章指出，道德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是近 40 年来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争论中，有一种观点把马克思指认为道德虚无主义者。所谓“道德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道德实存的伦理观点。综合来看，西方学者判定马克思是道德虚无主义者的“理由”主要有三个：一是认为马克思的彻底无神论立场，决定了他必然否定包括道德和伦理价值理念在内的一切超感性领域的存在；二是认为《共产党宣言》主张“不进行道德说教”并“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中包括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决裂；三是认为马克思从本质上把道德把握为一种隶属于上层建筑的次生性意识形态范畴。事实上，西方学界用来指责马克思是道德虚无主义者的三个理由，都是基于对其相关思想的误解与误读。通过对马克思文本语境的整体把握和解读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拒斥纯粹的道德思辨与说教，但是其思想明显具有浓厚的价值承诺和道德诉求，将其指责为道德虚无主义者显然是错误的。

## 王兴赛：《青年黑格尔与启蒙》

中心成员王兴赛副研究员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发表文章《青年黑格尔与启蒙——兼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文章指出，根据“*Aufklärung*”及相关词在黑格尔早期（1785-1800）作品中出现的情况可知，启蒙运动构成黑格尔的教育背景，青年黑格尔首先像门德尔松和康德一样肯定启蒙或启蒙运动在科学、艺术、宗教、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同时黑格尔在这段时期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青年黑格尔在道德宗教层面批判启蒙理智不能真正推动人们的道德和宗教情感；二是青年黑格尔在历史性、多

样性和现实性层面批判启蒙概念的抽象性和同质性。门德尔松、康德与青年黑格尔对启蒙运动的态度有同有异，且都涉及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康德和门德尔松的划界方案与黑格尔的和解方案都存在问题，或许更为可取的做法是在划界基础上对理论问题采取理论思维，对实践问题采取实践思维。

### 肖恩·塞耶斯：《恩格斯与唯物主义》（覃万历译）

中心成员覃万历博士在《现代哲学》2020年第1期发表译文《恩格斯与唯物主义》，原文著者为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文章指出，唯物主义认为存在或发生的一切都是物质的，可以用纯粹自然的术语来描述和理解，不必求助于神圣创造者或非物质的心灵。这种哲学是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但恩格斯强调，将这种一般的哲学观与特定思想家在特定时期提出的特定形式区别开来是重要的。唯物主义往往作为狭隘的、机械论的和还原论的哲学出现，恩格斯称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为“机械”唯物主义，如今它通常被冠以“物理主义”之名。在恩格斯看来，这并非唯物主义的唯一形式。恩格斯致力于发展一种非机械论的、非还原性的哲学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是原创性的，并且具有重要的当代哲学意义。

### 周宏胤：《句形树白描——符号指谓的句法结构图解》

中心成员周宏胤博士生在《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发表文章《句形树白描——符号指谓的句法结构图解》。文章指出，人运用符号认识对象的基本形式为符号指谓，其基本句式可表示为“s是p”。其中，s代表主词，其作用在于指出一个对象；p代表谓词，其作用在于说明该对象；指谓配合，从而实现对该对象的一种认识。通过对基本句式中所包含的主词和谓词的种类进行区分，我们可以划分出符号指谓的三个次级句式，分别是个别句（主词为个别词，谓词为实在词）、实在句（主词和谓词均为实在词）和范畴句（谓词为范畴词）。借助句形树模型，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这三个次级句式的句法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关联情况，进而勾画出符号指谓在句法上的总结构。